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

WOSUO ZHIDAO DE MINGREN MISHI

他们是 怎样成名的

TAMENSHI ZENYANG
CHENGMING DE

文 昊 / 编

一手
独家史料
亲历亲见
亲闻

说官说商 说权说钱 说名说利 说情说义 说文说武 说谋说计
——点击显要名流，细说鲜为人知的前尘往事
读成读败 读得读失 读起读落 读兴读衰 读浮读沉 读荣读辱
——聚焦人情世事，读懂命运福祸的因果缘由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

他们是 怎样成名的

文 昊/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们是怎样成名的/文昊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1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

ISBN 7-5034-1591-6

I. 他… II. 文… III. 名人-生平事迹-中国-清后期~民国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8049 号

责任编辑: 于保政 封面设计: 孙少伟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装: 北京雅龙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125 字数: 405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总 定 价: 224 元 (本册定价 28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工厂负责退换。

从历史细节读成败因由（代序）

“读史使人明智。”但这并不等于说，无论是谁，只要读一读历史，就一定都能变得“明智”起来。若要真正取得“读史使人明智”的效果，则必须对历史的认知达到“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的程度。假如“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史实的了解不够全面、细致、深入，那就不可能从“史实”中得出正确、有益的“史识”。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可见，历史是多层面、纵横交错、纷纭复杂、千变万化的，历史的发展演化是一种“合力作用”的产物，而要读懂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经验教训，就应该尽可能走进历史的深处，多方面了解更多的历史细节。

说到“历史细节”，就必然涉及到过去的人和事——既包括已成昨日的人生，也包括已经发生的往事。事因人起，人以事存，人和事总是息息相关、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当然，作为历史细节的“人”和“事”，不是大而化之的“大事记”，仅仅提纲挈领地罗列出“某人在某时某地做了某事”，而是要说

出“某人为什么要做某事、具体是怎样做的、结果如何”等诸多具体而微的琐细之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个性因素。

爱因斯坦认为：“如果不深刻研究科学创立者的个性发展状况，那就只能了解科学工作的一般内容，而不能理解这些工作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也就是说，每一项重大科学成就的产生，都是与创造了该成就的各位科学家自身的个性特征息息相关的。这个观点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的人，其成就大小乃至事业兴败，都同样能从他们的个性品质中找到答案。正因如此，所以在读史时就不能不注意考察各种人物的个性因素。

拿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各种人物的兴衰成败来说，无不与其固有的个性密切相关。比如，袁世凯和蒋介石都是心性狡诈、热中耍弄阴谋诡计的行家里手，既善于结党营私，也精于利害算计；既深知拥兵自重、以武力为后盾的重要性，也明了摆弄权术、玩弄他人于股掌之间的种种“韬略”。而世人在读有关他们的历史时，则大多只关注于他们“以阴谋起家”的一面，却忽视了其“以阴谋败家”的另一面；或者仅看到他们上台后“满朝朱紫贵，尽是一家人”的“空前盛况”，却无视于他们倒台时“树倒猢猻散，限来各自飞”的凄清落寞场景。一旦忽视某些重要的历史细节，就很难对历史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结果便会得出错误的历史经验，当然也不会变得更加“明智”。

又如，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应当算是北洋军阀中“执牛耳”的佼佼者，但其在反动阵营中却也并未做到“一呼百应”，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掀起了文争武斗。究其原因，除了段祺瑞个人迷信武力统一、刚愎自用等缘由外，还与他信任并重用徐树铮这个人有很大关系。以民初政坛上有名的“府

院之争”为例，这场政争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总统府秘书长丁佛言与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之间的争斗：当时，府院之间的很多政务都不是通过黎段之间直接商榷、决定的，而是由丁、徐二人每日彼此洽谈沟通；然而，丁佛言是一个粗鄙无学、浅躁无识却又好大喜功、喜欢揽权自为的“十足官迷”，而徐树铮则是胆大量小、貌智心愚而又惯于煽风点火、搬弄是非的“小扇子军师”，这样两个负气逞才的著名好事之徒“狭路相逢”，怎能不兴风作浪，上演一出争权夺利的好戏呢？不过，在一般的历史书中却很少谈及这类情节，以至人们虽然大都知道段祺瑞有刚愎自用的性格，但却很少知道他还有“刚愎他用”的情形。

许多史书通常都是忽略细节的，然而，只有更多地关注历史细节，才能读懂历史背后的历史，洞察常情深处的隐情，进而体悟出人生世事或成功或失败的内在复杂因由，在品读历史的过程中逐渐使自己变得愈加“明智”。

司马迁说他著《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而这句话恰恰也从历史细节的角度点明了人生世事的兴败关键，就是“天”、“人”以及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效果。具体而言，也就是“天时”、“人为”、“人为与天时之间是否相得益彰”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从根本上说，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要受其所处时代的总体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

“时势造英雄”这条客观规律，所体现的正是“天时”对于人事兴败的作用。因此，古人便有了“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的感慨，孟子才会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所谓“时势比人强”，如果社会环境或组织环境没有给人们提供有利于施展才华的客观时势，或者客观时势虽然有利而个人却不知如何充分加以利用，甚至逆时势潮流

而动，那同样都会走向失败之途。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黎元洪之被举为民国总统，康有为之复辟失败等诸多史实，无不验证了这个道理。

其次，在同样的客观时势面前，不同的人之所以有成败之分，且其成败有程度大小之别，则是由于个人及其团体的具体状况所致。这就是决定人事兴败的“人为”因素。

杜牧有句诗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然而，这个说法只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客观时势，却忽视了人为因素——试想，如果把“雄姿英发”、智勇双全的周瑜换成胆小如鼠、只顾计较个人利害荣辱的张昭，那么即使客观时势再有利十倍，也同样逃不脱“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凄惨结局。可见，一味与世浮沉、俯仰由人而不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话，也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此外，无论“天时”还是“人为”因素，其对于人事兴败的影响最终必将体现和统一于二者之间是否能够相互为用、相得益彰。“天时”和“人为”因素的具体结合状况，通常决定了人事兴败的时间长短。

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此新旧蜕嬗之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

中，新旧不同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

从一定意义上说，陈寅恪先生说出了人事兴败的原因所在，尤其从短期来看更是如此。但正如美国思想家、政治家富兰克林所说：“你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同一个人，也能在同一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做到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所谓“风物长宜放眼量”，一旦把观察的视角延伸到历史的长河中，则会发现历史毕竟是公正的，只不过历史的演变所遵循的是一条“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客观规律而已。

世无艰难，何来人杰？事实上，大浪淘沙，方显英雄本色；沧海横流，才见壮士豪情。那些“不肖者”尽管颇有机巧，却却不免遭遇“速生速灭”的命运，在发迹之后不久就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真正的“贤者”虽然笨拙一些，但他们的德行和功绩则会被世人永远铭记，终将彪炳史册。“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其理即在于此。

一般说来，由于历史本身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及其惯性等原因，使得“天时”与“人为”因素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常常会表现出一种“滞后现象”。正因如此，所以一些人总被浮华遮望眼，常常为了图一事之利而遗一世之害，逞一时之强而留百代骂名。这种“过把瘾就死”的想法和做法，其实是一种鼠目寸光和浅薄无知，既不给自己留后路，更想不到给后辈子孙留条路。

每逢社会转型期，由于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变化多端，故而人生命运就更加难以预料，且世事变化的速度明显加快。在此情况下，就使得上述“滞后现象”常常直接表现为

“现世现报”。这种情况，无疑更加有利于人们从简短、急速的历史变化中读懂人生世事的成败因由。

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四个最混乱的时代，一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二是儒学衰微、“名士”勃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是鲜讲廉耻、注重实利的五代十国时期，四是内忧外患、变乱频仍的清末民国时期。其中，尤以清末民国时期更被称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奇劫巨变”，这一段历史发展的曲折多变、纷纭复杂、五彩斑斓、多灾多难，更加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迷离之色。因此，对于这段时期的历史，党和国家领导人早就给予了充分关注和高度重视。

1959年，周恩来给人民政协提出了一项新任务，那就是征集文史资料。当时，他指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他还说：“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要勇于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从那时起到现在，人民政协所征集的文史资料数以亿字计，可谓汗牛充栋，洋洋大观。

概而言之，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最大特色和优点即在于“亲历、亲见、亲闻”。其作者大都经历过近现代中国社会动荡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接触过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有的作者本身就是名重一时的显要名流，他们不仅阅历丰富，而且来自各个方面，既有过去的军政界要人，也有经济、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因此，他们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而做出的回忆，无疑可以补充、匡正历史文献的缺失与不足，有助于人们更加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

同时，前人写史尤其是修“正史”时，或因顾虑顾忌于

当道说“实”，或因担忧诟病于后人说“俗”，所以常常有意无意地隐去一些虽然琐细但却重要的情节而仅记其概要大略，并在彰否人物、点评事件时显得四平八稳，甚或故意多有溢美之辞，结果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所谓“正史”便成为清一色的“为帝王将相做家谱”了。相比之下，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则除了要求在内容方面尽量做到“求真写实”之外，在选材与写法上则往往可由各位作者自由选择，随意行文；即使对于同一人物、同一事件的记述，常常也会采取杂糅多家、诸说并存的态度。再加上作者们都早已过了“不惑”、“知天命”之年而步入了花甲岁月，对人情世事的认识和感悟自然更加洒脱、透彻。所有这些，都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辨别历史的真相，理清人事兴败的来龙去脉。

《我所知道的名人秘事》丛书，就是从这些文史资料中经过精挑细选之后编辑而成的。本套丛书选取的史料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中的典型人物及其所经历的重大事件。这些人曾经都是名人，他们或权倾当道，或名动一时，或雄踞一地，或富甲一方。当然，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官员，也有商人；有华人，也有洋人；有军人，也有文人；还有遁入空门的出家人……

虽然人们常说“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但实际上，人生并不总是梦，往事亦非都如烟。尤其对于那些发生在大动荡、大转折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和纷繁世事来说，后人更需要多一些了解和认识。

当然，“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而且，由于不同人在思想、见识、立场、偏好、职业、家世、个性和人生阅历等各个方面存在差异，以及每个人所接触和关注的历史细节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在读史过程中往往也会品出不同的味道，悟出不同的道理。

比如，孔子读出了“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诸葛亮读出了“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唐太宗读出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王安石读出了“治大国如烹小鲜”，司马光读出了“君明臣直”、“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曾国藩读出了“内用黄老，外用儒墨”；胡适博士读出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先生读出了历史“吃人”的一面；周恩来读出了“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毛泽东读出了“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观人必于其微，从小可以见大。读史之道亦然。若要从历史中得到更多的启发和教益，就应该从历史细节中读懂成败因由。

于保政

2005.1. 北京

目 录

从历史细节读成败因由（代序）（1）

名流学者的成功诀窍（1）

思想，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也是人生最可靠的资本。正如俗语所说：“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人世间真正有用的学问，从来都不是通过死啃书本或者简单模仿别人就可以轻易获得的，更不是依靠别人硬性灌输的。

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将告诉人们：“学问必须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而著名翻译家、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姜椿芳也以自己的切身实践，为世人解说促使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关键诀窍。

梁漱溟细说“我的自学小史”（1）

姜椿芳畅谈“我的翻译之道”（32）

文坛巨匠的不懈奋斗（50）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曾经诞生了无数耀眼的文学巨匠，他们的辉煌成就至今仍然感染着世人。他们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当然并不是一蹴而就

的。探究他们的成功之路，无疑有助于今天的文学青年更好、更快地走向成功。

聆听这些文坛巨匠们亲口诉说自己敲开文学殿堂大门的种种经历，阅读他们在迈向成功之路上的最初感受和经验，无异于使人与20世纪中国文学巨擘展开面对面的谈话、心与心的交流。

- 臧克家：我是怎样成为诗人的 …………… (50)
 姚雪垠：我走上文坛的道路 …………… (64)
 张恨水：我的创作和生活 …………… (101)
 陈荒煤：少年时代的梦幻 …………… (131)
 萧乾：往事的回忆 …………… (149)
 傅敏：追忆先父傅雷 …………… (190)
 李准：敲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 (204)

2

书画大师的孜孜追求 …………… (225)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不仅是永远没有止境的，而且每一位艺术大师都是经过一番潜心揣摩、反复研习和刻苦砥砺之后，才终于修成正果、名扬天下的。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感受艺术大师们孜孜以求、坚忍不拔的精神，汲取画界耆宿们精益求精、敢为天下先的成功经验，无疑可以大大缩短自己走向成功的时间和路程。

- 回忆父亲吴昌硕 …………… (225)
 父亲张大千的画业 …………… (229)
 求美的勇士——潘张玉良 …………… (236)
 刘海粟：人创造路，路召唤人 …………… (248)
 吴作人：艺海无涯苦作舟 …………… (264)

漫画家丁聪忆述“转蓬的一生” (278)

音乐舞蹈名家、戏剧电影明星的艰辛起步 (29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每一个成功者向目标逐渐逼近的奋斗过程中，都洒下了不为人知的汗水；众多音乐舞蹈名家和戏剧电影明星所获得的一次次掌声和赞美，都是他们以自己的心血为代价换来的。

当然，所谓“万事开头难”，看一看功成名就的成功者到底是如何踢好“头三脚”的，必将使人受益匪浅。

- 我学习音乐的经过 (293)
- 戴爱莲的舞蹈生涯 (306)
- 新风霞幼年学艺记 (322)
- 俞振飞艺林学步 (357)
- 陈强感慨话当年 (371)
- 谢添通向银幕的路 (403)
- 项堃走上艺术之路的第一步 (413)
- 关文清好莱坞寻梦录 (424)
- 石羽追忆漫漫话剧路 (483)

名流学者的成功诀窍

思想，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也是人生最可靠的资本。正如俗语所说：“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人世间真正有用的学问，从来都不是通过死啃书本或者简单模仿别人就可以轻易获得的，更不是依靠别人硬性灌输的。

中国的“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将告诉人们：“学问必须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而著名翻译家、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姜椿芳也以自己的切身实践，为世人解说促使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关键诀窍。

梁漱溟细说“我的自学小史”

1942年我在桂林时，应《自学》月刊编者之约，撰写《我的自学小史》一稿，未写完。1974年抽暇就原拟纲目简略补写完成。我的一生是一个自学的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因此现在把它拿出来发表。个别文字作了修改，内容则一仍其旧。

学问必须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有受用。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是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己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己生命而打成一片的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我愿指出：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又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八十多年来的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近代的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的，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跟今八十八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公元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亦就是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一个关键，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

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父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从外祖父离开云南，没有回去。祖母又是贵州

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云南省人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以又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实兼有南北两种气质，而富于一种中间性。

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通婚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似亦具一中间性。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仕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着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稍长到19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过着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而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不少。40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我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像这样一个多方面荟萃交融的家庭，住居生活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困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我的父亲

促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的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